

古滇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时空交集

——对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青铜头盔的探索解读

樊海涛

一件并不普通的古滇青铜头盔

从1998年开始的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,清理出大量滇文化和汉式墓葬,随葬器物丰富,特别以首次发现大量的滇国漆木器、陶器著称,被评为“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”之一。该地M113出土的一件罕见青铜头盔残件,发掘报告说它“似帽形扇面,有桦眼及扣,后端似其他材料制成,已

朽无存。面阴刻两鸡两虎,沿刻陶纹。M113:224,扇面宽40.4厘米”。从已出土的上万件滇国青铜器中,这件头盔残件看似普通,但迄今云南还没有发现类似的第二件实物或图像。这件头盔与当时中国头盔明显不同,头盔上的图案是被驯化的红原鸡,又与云南现代“茶花鸡”形象基本一致,因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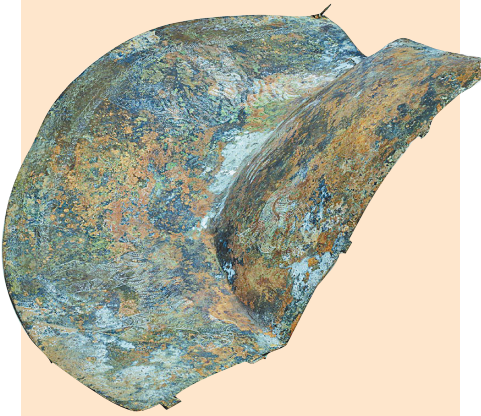
头盔的古希腊文化色彩从何而来

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模拟还原,这个青铜残件的原型为一件类似于蒙古包状的圆形顶宽平沿帽。这种类似大帽檐的圆形遮阳帽式头盔,在云南乃至我国周边极其罕见。而在希腊的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中,收藏着一座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骑兵大理石雕像,这名骑兵就头戴类似的帽子。在雅典的马迪托大街也曾出土过一件圆顶宽沿的青铜头盔,而且“头盔的边缘被一排小孔贯穿,可能是为了在头盔外面缝上一层材料罩,从而把头盔伪装成一顶帽子”。在希腊,这种圆顶宽沿的帽子被称为“petasos”,边缘宽,可以遮挡阳光。希腊、意大利出土的青铜时代残片、绘画和雕塑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形象,多为羊毛材质。

近年来,一些研究表明,古代云南与古代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存

在的。这种交流不是某种直接的“道路”,而是曲折迂回,通过很多不同的渠道形成交流,结果体现出特殊的时空差异。昆明羊甫头出土的这件具有古希腊文化风格的青铜头盔,其间传播者可能是欧亚草原南下的游牧人,方向可能是从藏彝走廊北向——北方草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地区。中国考古专家郭物在《边地文化传播带: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为中心》一文中指出,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大墓中发现的“蹄足柄”的勺,羊甫头M113中也同时出土了一件有类似“蹄足柄”的漆木女俑。这两件带有外域风格的器物同出一墓应该不是偶然的。青铜头盔残件从工艺、风格来看,应是云南本地制造的,但其特殊的造型中蕴含着遥远的异域文化色彩,为探索古滇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贵的物证。

1999年,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头盔残件。这件貌似不起眼,残缺变形的青铜头盔,竟然是一件有着明显古希腊文化风格的典型西式头盔,透露出古滇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曾经出现的交流互动信息……



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西汉青铜头盔残件



头戴铜头盔的希腊骑兵像(局部)



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铜头盔上的鸡形象

两千多年前被驯化的鸡形象

青铜头盔残件上有两组刻纹图案,纤细流畅,靠近边缘部分为两头背向而立的虎纹,张嘴龇牙、长尾上翘,似作行走状。在古滇国,虎多象征统治者的威严、权力,出现在头盔上暗喻了战士的勇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头盔的顶部有两只逆时针站立的公鸡。众所周知,家鸡是由原鸡驯化而来,在生物学上,两者自有专业的区别,但从形态来看,两者并不容易分辨。“原鸡的体形与家鸡十分相似,只是稍小些。公鸡的前驱羽毛则多黑褐色,背毛黄而带黑纹,胸羽浅褐色,越向后越浅。原鸡的内部结构及鸣声等也与家鸡极相似。此外它不但易于饲养,而且与家鸡杂交所产生的后代还具有繁殖力。”(《生物学通报》2005年第1期)。换言之,原鸡与家鸡从形态来区分,羽毛颜色是一种重要的判断依据。此外,原鸡体型小,家鸡体型大,原鸡保持鸟的一些特性,可以飞行,能飞200米左右,而家鸡并不能飞。

从体型细节来观察比较,羊甫头青铜头盔残件上的鸡形象,与原鸡的体型区别很大,极可能是被驯化的家鸡。从图像看,鸡是侧面像,描绘准确而生动,比例协调,细节清晰,雄鸡体型壮硕,头昂尾翘,似船形,顶有肉冠,喉侧有肉垂,翅膀小,主翼羽不大,而尾羽长,下垂的蓑羽尤其明显,几乎拖地上,小腿粗壮、足胫短,无足距,外形与云南的“茶花鸡”接近;从驯化经验看,肉用品种鸡腿较短,初步可以判断它是一种被驯化的肉用鸡;从生长周期看,随着鸡龄的增长,足距会越长,图案上的鸡无足距,证明其为幼鸡,这极可能是滇人驯养的家鸡。

类似的鸡的形象,在昆明市呈贡区石碑村第二次清理时也有发

现,为一铜扣饰,时代与羊甫头出土的青铜头盔接近,均为西汉。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也出土过一件西汉时期的猎虎铜扣饰,是滇人猎虎胜利而受到欢迎的场面:六人身后背抬一虎尸似作展示,右侧两人一人抱鸡,一人捧一酒器。这件铜扣饰中的鸡尾羽也很长,从比例来看,体型颇大。难得的是,它展现了人与鸡之间的关系,以及鸡作为庆祝猎虎的美食等重要人类学依据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的“上仓图”中有母鸡、小鸡在地面啄食的图像,足可证明滇人在西汉时期确有养鸡行为,青铜头盔上的鸡形象,进一步展示了滇人所豢养的,可能就是从红原鸡驯化后类似“茶花鸡”的品种。

2020年,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人员经过多年努力,获得了5个红原鸡亚种的基因组数据,以及分布于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、东亚、欧洲等地区家鸡的全基因组数据,通过大量的群体遗传学分析,发现家鸡是由红原鸡亚种驯化而来,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、泰国北部、缅甸等地区,说明该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驯化中心。这一研究成果在《Cell Research》发表,世界瞩目,被誉为“里程碑式的基因研究发现”。云南是世界家鸡的驯化中心地之一,青铜头盔残件上的类似“茶花鸡”的形象,与现代科研成果形成了很好的呼应。

鸡在头盔上的出现,与鸡反应敏捷、勇猛好斗有关。公元前4世纪雷斯人头盔上有类似鸡冠的凸起,用羽毛装饰,寓意佩戴者像鸡一样警惕、敏捷、勇猛。中国民间有“英雄志图”,是以两只雄鸡为主题的民俗画,体现了雄鸡勇于搏斗的特性。

滇文化的对外交流

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滇中地区,以滇国为代表,形成了亚洲青铜文明的一个核心区,文化辐射广泛,甚至对南亚、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青铜文化中心,滇文化汇集了多方因素,对外交流的渠道必然存在,交流的方式是曲折而多样的,在遥远的地理距离传递中,形成了很大的文物、文化的时空差异与变化,客观上令我们在滇文化中看到了许多与异域文化“似是而非”的考古材料或现象。

云南位处中原文化的边缘,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距离。滇人族群是滇中地区势力最强大者,多种文化通过不同的“文化传播带”播迁,对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“输血”,使其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滇文化遗址面貌复杂而多样,这是典型的文化传播现象造成的。

云南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这有历史的、地理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深刻原因。滇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熔炉与稳定器。滇文化与中国古代三大文化传播带都有关联,分别是:从东北到西南的文化传播带;沿海地区百越文化传播带;从北到南的藏彝走廊及其延伸文化传播带。从一定程度看,云南是三大文化传播带的交汇点与落脚点。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三大文化传播带的客观存在,一方面汇聚了多族群的文化,另一方面也把云南作为历史上的边疆地位牢牢确定。这种文化归属感的形成,甚至比地理上的划分更为紧密,更深入血脉。

(作者单位:云南省博物馆)

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|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

昆明县令张瑾:名不可磨石不烂

王琪 阳正伟

张瑾,字子瑜,又字去瑕,号泽园,明崇祯二年(1629年)出生于江南江都(今江苏扬州)。清康熙二年(1662年)考中举人,康熙年间授云南昆明知县。《清史稿》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分别将其列入“循吏传”“名宦传”。据《新纂云南通志》:“张瑾为昆明令,善政甚多,而阮、岑、唐诸《志》语焉不详,治绩莫由表现。兹据《清史稿》等书补之,俾后之为官吏者有所取法云。”虽然张瑾年过花甲才被授任昆明知县,任期仅3年,但这是其人生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天资聪颖 家教有方

据周彝《张泽园行状》及宋和《张泽园墓志铭》记载,张瑾先祖是西域人,明洪武十二年(1379年),其始祖阿布拉都因军功被赐姓张,后来迁居扬州。“代以武功显,至君之大父梅亭,始以文学造其家。父西山,为士重”,张瑾12岁丧父时,见仆人懒散,“乃大书仿约榜中庭,纲条井井”,展现了杰出的管理才能,乡里老者认为他“必以吏治显”。后来张瑾因战乱被军队掳走,受到参将王叙宾的赏识,认为他“神检,必儒家子”。张瑾的母亲是名门之后,“出自名儒生术先生之后,能世其学,称为女宗”,张瑾的成就离不开母亲对他的谆谆训诲。当有人称赞张瑾为“老狱才”时,他的母亲严厉告诫儿子:“我不欲尔效张汤(汉代的酷吏)劾鼠也。”

表明她虽然希望张瑾出人头地,但不愿他成为酷吏。

断案有法 勤勉于公

张瑾在断案时的做法常常出人意料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有一位将军的仆人因杀人被张瑾捕获,负责刑狱的按察使摆下酒宴招待张瑾,想请他网开一面,张瑾却“阳诺之,退而正其罪”。巡抚的儿子想要夺取一位书生的未婚妻,张瑾就让书生的和他的未婚妻在县庭拜堂成亲,并声明:“法不得娶有夫之妇,妇乘我舆,婿乘我马,役送之归,有夺者治其罪”。当地一个豪强侮辱官绅,张瑾听说他的妻子患病,为了让他照顾妻子,便法外留情没有惩罚他。后来,张瑾又让张瑾请求释放豪强,他向人解释原因:“缙绅力终不足胜豪,豪暴戾又有病妇,杖之益与缙绅仇,后事不已。不若我为恶而归德于缙绅,怨可解。”既顾全人之常情,又化解了双方的仇怨,这种断案方式不同一般。

张瑾断案明快,据《清史稿》记载:“(张瑾)初至,滞狱以百数,断讫皆当。后一省疑狱辄付瑾治,屡有平反”。《张泽园行状》中记载,上一任昆明县令“年累而狱山积不能理”,张瑾到任后,仅一个月就把所有积案全部审理完毕。此后但凡府城碰到疑难案件,上司都会先问“经昆明断否”。张瑾严于律己,为还老百姓公道,办案不辞辛劳。《张瑾传》记



清康熙时期昆明县令张瑾画像

载,张瑾断案从来都是不分昼夜,有了案子,立即申明,绝不拖延。纵然时间已经很晚,他也会说“就可坐庭也”,一定要把案子审完才肯休息。

垦田浚水 谋民之生

《清史稿》记载,张瑾出任昆明县令时,正值朝廷刚刚平定吴三桂叛乱,昆明百姓赋税繁重,张瑾曾请求朝廷减免部分赋税,但未获批。他便“疆亩荒地,招流亡,给牛种”,鼓励垦荒,取得了显

以劳卒官 永垂来祀

张瑾任昆明县令时已经61岁,3年后因劳累过度逝于任上。云南府昆明县儒学生员郝维时所作《祭张泽园文》评价他的功绩:“惟是甫阅岁,而老者安,少者育,饥者食,劳者息,死者葬,男女

著的效果,“一年垦田千三百余亩,三年得万余亩”。昆明县曾有惯例,百姓每年要拿出“十金”供县衙使用,张瑾认为“吾食禄于君,不食佣于民”,果断废除了这一惯例。

张瑾在任期间兴修水利。滇池在夏秋两季会暴涨入闸河,淹没田地。当时晋宁与昆明相邻,上级官员为保护晋宁的田地,准备把晋宁的水引入闸河,张瑾则认为此做法不妥,便与上级官员据理力争,最终保证了昆明百姓的利益。张瑾通过考察,了解到白沙、马袅、清水三条河道被堵塞,“因其高卑,疏其底滞,浚其源流,疆其畔屋,亲操版舆,躬行劳佚,积工万计”,最终治理好河道,解决了旱涝困扰。

《张泽园行状》记载,昆明县城大小东门外原是繁华的市场,因战乱导致荒废衰败,杂草丛生,盗贼在此集聚。张瑾命人“芟除其草窃,创造其室庐,以居流亡”,又“移城中骡、马、猪、羊诸市实其中,遂成货廛牧圈,而萑苻绝迹矣”,清除盗匪祸患,当地经济水平和社会秩序得以逐步恢复。

贫无家者,庶民顽不率教者,子弟穷而不能学者,夫子皆婚之,嫁之,化之,导之,非所谓因民而利,务实而不务名者哉!”“先生为县虽三年,而百年之化不能过”,他3年的治理,超过了过去百年的教化效果,因此确立了张瑾在百姓心中的地位。

《新纂云南通志》记载,张瑾死后,“巷哭路祭者,不可胜计。士民图其像藏之,请祀名宦。祭日,诸司皆至,为立“遗爱碑”。《张泽园行状》中也说:“滇人最重名,宦非有大功德于民者不祠,自庄躅、司马相如、诸葛亮侯以下,皆可指数,至是,请祠君。”在百姓眼中,张瑾与庄躅、司马相如、诸葛亮等对云南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等量齐观。张瑾出殡时,老百姓感念其恩德,“云南空城送”“万民请命上帝,当再生矣”。宋和在《张泽园墓志铭》中写道:“循吏夜台石一片,名不可磨石不烂。”张瑾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鞠躬尽瘁,为民谋利的实干精神,值得今天为政者学习。

(作者1单位:昆明学院人文学院;作者2单位:昆明学院科学技术处)

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
云南日报
云南廉政研究中心

联办

诗文云南

竹枝词中的火把节

耿嘉/文 刘建华/图



今年7月22日,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前一天,正值农历六月二十四日,是云南不少地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“火把节”。清雍正二年(一七二四)中进士,雍正十一年(1733)出任云南督学的浙江归安人吴应枚,写下一组30首歌咏云南风土人情的《滇南杂咏》,其中一首写道:

剽生盘佐椒餐。
佳节星回咏荐膺。
醉蒸松明照田畔,
要凭炎火逐蝗螟。

这首竹枝词体的风俗诗,一二句说星回节的应节食品剽生,三四句写星回节以火把驱逐虫害的愿望。吴应枚自注说:“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,切生猪肉杂椒姜食之。燃炬以多为胜,携照田陇,云可避虫。”云南石屏许印芳在所写的《星回节考》中解释:“滇中士大夫谓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,取‘星回于天’之义,考之民俗,是日但称火把节耳。”因届时都要“斫松为燎,高文余。入夜,争燃之。村落用以照田,以炬之明暗占岁丰歉”。

当代文史专家李孝友在《滇海联吟诗笺》中,提到了云南民族地区,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“星回节”的起源,“在滇池地区认为是纪念汉代曼阿娜的夫人阿南,在大理则认为是追思邓赓诤宁北妃慈善”,并引用一首佚名的《竹枝词》:

所松为炬以照田,
来年丰歉看明暗。
滇南为祭汉阿南,
苍洱追思唐慈善。

其实作为一种崇火的节庆活动,“星回节”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至远古。元代以前,中原诗家文人,包括生长于邻近四川者,很少履足云南,因而元代以前的诗文中,写云南的并不多,直接写云南节候的更少。以星回节来说,收入《全唐诗》的《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》,已经是中唐时期的作品,而且还是由云南本土的南诏王寻阁劝(骠信)所写。明清时期,大批文人名士为官云南,云南奇异的风土人情,吸引了他们的目光,激发了诗情。不少文士墨客,就曾以最宜于记述地方风物的竹枝词,吟咏云南的特殊节日星回节(火把节)。

明正德年间的吕及园,写有一组22首的《滇南竹枝词》,吟唱云南的天时、地利、民家妇、夷人、三教堂、物产、工作、花卉、果品、畜产、元旦、上元、二月二、三月三、端午、五月十三、六月二十四日、中秋、重九、十月朝、除夕。其中的《六月二十四日》写道:

剽生生食血腥和,
节重星回火炬多。
惨入松香起烟焰,
乱红烧遍万山河。

也是从火把节的应节食品剽生说起,说到燃火把者为了让火焰更旺,洒入松香颗粒,喷射的火光,映红了田野山河。清代余云焕的《泸沽竹枝词》,则感叹星回节杀羊宰牛、歌舞欢庆的热闹场景,如除夕夜一样:

家家门外火光燃,
椎髻簪花舞绣筵。
剽羊宰牛饮美酒,
鼓吹笙箫夜似年。

朱庆萱的《晋宁竹枝词》,呈现了荷花飘香黄昏后,火把节的鼓乐欢闹:

凭吊松明认劫灰,
星回时节藕花开。
门前鼓乐黄昏后,
夺得娘娥火把回。

延续数千年的节日,其功能往往是丰富多彩的。吴应枚的《滇南杂咏》中,另有一首有关火把节的诗,就提到了边疆各民族欢度火把节的另一个功能:

列炬回学海澄,
煥文燎火证元灯。
黎蒿寨是芙蓉镜,
不用扶藜可凭。

吴应枚自己作注说:“临安府学泮池深广,名学海,面煥文山。山顶藜蒿寨,夷人所居。每当大比,于六月星回节视池中火影,卜乡荐多寡,历科不爽。”明清时期的临安府,是云南科举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,每年榜上有名的人,据说占到云南全省的一半,有“临平榜”之称。崇文重教的风气,遍及临安城乡,连高居煥文山顶的夷人山寨,其星回节火把的火影明暗,竟与科考上榜多数的多少相关。在滇西,也有大理人李照在《星回节观炬竹枝词》写道:

向晚村村燃火把,
坟庐回亩照通红。
年来玉局峰头寺,
可有神光出夜中。

诗中所写,也是士子借这天的火把,祈愿、预测科考顺利与榜上有名。看来,田地丰产、风调雨顺和耕读传家、诗书继世,明清时期就已成为边疆各族民众的共同心愿。